

新 加 坡 大 學

報 學 會 學 刊

第 八 期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出版

目錄

(一)	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簡介	林徐典	一
(二)	星大所藏舊報章的文學史料價值	方修	八
(三)	從論語中看孔門的文學思想	林徐典	十三
(四)	論語節記	李健	三十二
(五)	左傳書名及其性質辨疑	潘文光	四十二
(六)	司馬遷的思想淵源及其創作態度	陳榮照	五十一
(七)	鄒衍學說探研	謝澤文	六十一
(八)	建安文學的承先和啓後	薛承明	七十
(九)	論孟子的文學藝術成就	傅健明	八十
(十)	Penyelidikan Tentang Kedudukan Pantun Dalam Kesusasteraan Lama Melayu.		

Oleh: M. K. PHOON

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簡介

代理系主任 林徐典

十四年來的中文系概況

新加坡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是在一九五三年開始設立的。當時，新大前身的馬來亞大學剛剛成立四年，學校當局鑒於華文高等教育是大學教育的重要一環，加上星馬華人社會正在積極籌備創辦南洋大學，中文系更有迫切開設的必要。關於中文系的主持人選，據說校方曾先後和胡適博士與錢穆博士接觸，但都沒有結果。最後便決定邀請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代理主任的賀光中先生來星主持。經過大約兩年的籌備和策劃，中文系便在一九五三年十月間正式開課。

賀光中先生主持系政十三年，從去年起，由於健康關係辭卸行政職務，暫由筆者代理。

十四年來，中文系教師的變動不大，曾經担任全職或兼職的教師，包括長期和短期的，按照時間先後，有周辨明博士、錢穆博士、王震先生、趙泰先生、李廷輝先生、尤光敏先生、盧紹昌先生、嵇哲先生、程光裕先生、楊宗珍女士、王叔岷教授、林尹教授、筆者、龔道運先生、李寶強先生、潘文光先生、和方修先生等；其中如現代詞壇祭酒的趙泰先生，馳譽國際的名學者錢穆博士，語言學專家周辨明博士，聲韻學泰斗林尹教授，易學者宿王震先生，校師學權威王叔岷教授等等，都是現代文學界或學術界的第一流專家學者，他們曾經在中文系服務，為中文系增加不少光彩。

一九六六年度，中文系全職教師應該有五名，即：教授一名、高級講師一名、講師二名、助理講師一名，另有研究生兼助教二名。但教授一職，已經懸空十多年，一名講師職位也還有待填補。總計去年全職和兼任的教師人數，包括兩名助教，一共是八個人。

中文系最初開辦的時候，由於入學資格受到限制，所以只有學生十名。當時，進入中文系攻讀的學生必須先具有劍橋文憑考試的華文優等成績并在大學主辦的入學考試中考取華文及格。但從第四年起，學生人數逐年增多，每年約有三四十名。一九六二年度以後，學生人數再度增加，每年由四五十名至六七十名不等。去年，在籍學生人數共有六十四名。和文學院其他學系比較，中文系的學生人數并不算多，這主要是由於中文系一向的收生原則是重質不重量，除非在中學時代已經有良好華文基礎的學生，決不予以錄取。目前中文系的入學資格，是必須在華文高級中學會考或是劍橋高級文憑考試考取華文及格，并且達到主修水準，或在其他的各種考試中（如高中三）獲取差不多同等資格的學生，才能受到考慮。另一方面，由於中文系的各種課程，全用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由英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學生無法選修。還有，每年進入星大的華校高中畢業生人數雖然不少，但多數都是選讀理科、法科、醫科、牙科或藥劑科，攻讀文科的學生并不多，而按照校方選課的規定，只有文科的學生才能夠選修中文系功課。由於上述的這幾種原因，所以中文系的學生人數比文學院其他學系要來得少。

一九五五——五六年度，中文系第一屆學生畢業，直到一九六五——六六年度為止，在中文系畢業而獲得榮譽學位的學生共有五十六名，平均每年五名，其餘的只得到普通學位。

一九六六——六七年度的畢業班，共有學生二十五名，將于今年一月中起參加畢業考試。

從一九六一——六二年開始，中文系接受南洋大學和其他華文大學的中文系畢業學生攻讀榮譽學位，為期兩年。直到一九六六——六七年止，被錄取的人數共有五十五名。南大同學在星大中文系，歷年來都有異常優越的表現。在南大開辦榮譽學位的課程以前，中文系招收南大畢業生攻讀榮譽學位的決策，可能不會有重大的改變。南大同學在星大中文系攻讀榮譽學位，也和中文系專修班其他同學一樣，必須攻讀由英文

系所開設的一科英文課程，目的在於使這些同學畢業後，能成為華英兼通的人才，這對畢業生本身以後的就業和出國深造，都有不少好處。

一九六〇年起，中文系開始接受本系畢業生進行深造的申請。在過去七年中，被接受攻讀高級學位的學生，總共有十七人，其中六人讀到中途沒有繼續。直到去年為止，已經獲得學位的一共有四人：獲哲學博士和文學碩士學位的一人，獲文學碩士學位的三人。目前還有七人正在攻讀文學碩士學位。

此外，中文系又有三名榮譽學位畢業生，先後獲得獎學金往港大深造，并且已經獲得文學碩士學位，載譽歸來，分別在大專學校和法定機構服務。另兩名榮譽學位畢業生則在馬大攻讀碩士學位。

中文系畢業生的出路是很廣闊的，根據非正式的統計，服務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人數最多，其次是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再次是工商界和軍警界，此外，還有少數服務於星馬的大專學校。

學制的變革與現訂課程

從一九四九——五〇年開始，到一九五九——六〇年為止，在這十一年中，中文系也和文學院其他各學系一樣，採行三年普通學位、四年榮譽學位制度，也就是說：一名學生要獲得文學士普通學位，需時三年，要獲得文學士榮譽學位，需時四年。在這種制度下，第一年必須選修四個學系的功課，選修中文系功課的學生，還必須從經濟、歷史、地理、巫文、印文、英文、哲學、數學等學系中，任選三系，攻讀各該系的必修課程。經過第一學年升級考試及格之後，從第二學年起，得自第一學年所選的四個學系功課中，任選兩系的功課為主修科目，一系的功課為副修科目。中文系功課可被選為主修科或是副修科。經過第二學年升級考試及格升入第三年級之後，必修的科目和第二年相同。第三學年結束，舉行畢業考試，成績及格可以獲得普通學士學位。假如主修科目中的任何一科考試成績特別優越，則可繼續留在本系攻讀榮譽學位課程，為期一年。榮譽學位按照畢業考試成績分為四個等級，即：一等榮譽學位、二等（甲級）榮譽學位、二等（乙級）榮譽學位、三等榮譽學位。

但從一九六〇——六一年起，文學院改行三年學位制。學生在攻完一年級課程之後，按照升級考試成績，從第二年起就分為兩組，成績良好的屬於第一組，攻讀榮譽學位，成績平平的屬於第二組，攻讀普通學位，同樣為期兩年。攻讀榮譽學位的專修一系的功課，攻讀普通學位的兼修三系的功課，其中兩系的功課是主修科目，一系的功課是副修科目。

這種學制存在着相當嚴重的缺點，因為在第一學年考試結束後，一名學生的前途就已經被決定了，攻讀榮譽學位的除非是畢業考試不及格，至少也能夠得到第三等榮譽學位，攻讀普通學位的，即使在第二和第三年中學業成績突飛猛進，畢業考試結果異常優越，充其量也祇能得到一個普通學位。

所以從一九六三——六四年開始，文學院的學位制度再度改變。自第二學年起，學生可專修一系的功課，也可以兼修兩系的功課，不再像以前那樣劃分為攻讀榮譽學位和普通學位的兩組。學生參加畢業考試以後，成績優異的可以得到榮譽學位，否則只能得到普通學位。一名學生是能否夠得到榮譽學位，全憑畢業考試成績決定。這種學位制度，一直到了今天還施行着。

由於社會科學院在去年宣告成立，許多以前原來設在文學院的學系，都撥歸社會科學院管轄，設在文學院的現有學系，除中文系外，還有歷史系、地理系、哲學系、英文系，和即將復辦的巫文系等。此外，文學院學生還可以選修以下各系的功課：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系、經濟系、政治系和商業行政系，以及理學院的數學系等。

在現行學制下，文學院的學生，第一年必須選修三個學系的功課。選修中文的學生，還必須選修其他兩系的功課。但從第二年起，到第三年畢業為止，可以專修中文，或是兼修中文。所謂專修中文，就是只攻讀中文系所規定的全部課程；所謂兼修中文，就是除了攻讀中文系所規定的半數課程外，還可以選修另一個學系的半數課程。專修班學生以本系畢業考試成績為憑據，兼修班學生以兩系畢業考試成績為憑據，分別

被頒以榮譽或普通學位。

從一九六三——六四年開始，第三等的榮譽學位宣告取消，剩下三個榮譽學位等級，就是：一等榮譽學位、二等（甲級）榮譽學位、二等（乙級）榮譽學位。學生參加畢業考試及格但都不能達到二等（乙級）榮譽學位所應有的水準，只能獲得普通學位。根據英聯邦大學的傳統，能夠獲得二等（甲級）榮譽學位的畢業生，成績已經算是十分優越，可以申請入研究院再行深造，攻讀碩士學位。至于一等榮譽學位經常只能頒給以後在學術界中可能有傑出成就的學生。由於這類學生並不是每年都會出現的，所以某些學系有好幾年都沒有頒發這樣的學位。同時，由於這類學生不大可能在一年中大批出現，所以最多只有一兩名在同一年中能夠獲得一等榮譽學位，超出兩名的就很罕見了。

中文系的課程，十四年來迭有更動。開辦初期，一年級學生必修的課程包括中國國學、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專書研究；大學、中庸、論語，和翻譯等。二三年級分為主修副修兩班。主修課程包括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專書研究；禮記、書經、易經、左傳、墨子、荀子、專題研究；宋明理學。副修班又分為甲乙兩組：甲組供程度較高的學生攻讀，課程包括：文字學、聲韻學、目錄學、經學史、文學史、先秦文學、國學概論、藝術概論、專書研究；禮記、書經、左傳、和翻譯等。乙組供程度較差的學生攻讀，課程包括：漢學概論、華語、會話、初級翻譯、報章研讀、文學作品選讀，和作文等。第四年攻讀榮譽學位的學生，除必須撰寫一篇專題論文外，還須攻讀若干高級課程，包括經學、語學、詩選、文選、文學史、目錄學、及任何由系規定的專題研究。

十四年來，由於學位制度有過多次改變，中文系課程也隨着不斷修訂。目前，一年級學生修讀的課程包括：文學概論、文學原理、新文學、目錄學、讀書法、專書研究；大學、中庸、論語和翻譯等。

二三年級分為兼修和專修兩種不同的班級。兼修班第二年的課程包括：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文學史、文化史。第三年級的課程則包括文學批評、文學史和專書研究；禮記或左傳。至於專修班第二和第三年級的課程則有：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文學史、哲學史、文化史、通史、翻譯、英文、專書研究；詩經或楚辭、禮記或左傳。此外，去年新開的課程還有荀子和馬華新文學。

中文系的功課，除英文一科是由英文系負責採用英語講授外，其餘的全部課程都是用華語講授。

按照文學院現行的考試規則，在三年中，只有舉行兩次考試，即第一年年終的升級試和第三年年終的畢業試。只有少數學系在第二年年終舉行學年考試，但是這種學年考試并不影響學生升級，只影響畢業考試的成績。另有一些學系則以測驗代替第二年的學年考試。一年級升級考試的中文科目共有三科，每一種科目的考試時間是三小時。三年級畢業考試的中文科目，兼修班的共有四科，專修班的共有八科，每一種科目的考試時間也是三小時。

中文系也和本校的其他學系一樣，實行講課和輔導研討并重制。每門功課每週上課一至二節，每節約一小時。除上課外，學生還必須作專題研究，經常是每門功課每學期必須作一篇專題論文，報告研究成果。作業經過批改之後，由任課教師或指定導師，分組主持研討，每組經常都以十人為限，使每名學生都能夠針對某一些意見分歧的問題或是在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難以解決的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辯論，然後由主持研討的教師加以總結，并且盡可能找出一個完滿的結論。這種輔導研討制度，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辨析問題的能力，具有很重大的啟發作用，所以在星大和講課相輔而行，是相當重要的教學方式之一。

星大實行校外外委員聯合考試的制度，除一年級升級試只由本校主持外，每年的畢業考試都由校內外的考試委員會聯合主持其事，有時校外考試委員還須遠道來星監督考試進行。校外考試委員會任期三年，中文系歷年的校外考試委員，是前香港新亞學院院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組成學院之一）錢穆博士，前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甲寅文專家董作賓教授，漢城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所主任李相殷教授，前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主任，現任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主任高明教授。高教授是中文系現任的校外考試委員，月內即將來星主持本學年的畢業考試。至于曾担任中文系高級學位校外考試委員的，則有香港大學中文系的饒宗頤先生和劉百閔先生，香港新亞學院中文系的曾克崙先生，

和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的楊家駱教授。

價值無比的圖書與報刊

主要是為中文系師生的教學研究而設的中文圖書館，也是在十四年前宣告成立的，館政一向由蔣振玉女士主持。十多年來，中文圖書館對中文書籍的搜集蒐求，不遺餘力。成立初期，得到本校前校長李光前博士和已故的實業家葉祖怡先生的鼎力贊助，舉凡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經學、美術、游藝、農業、工藝、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總錄書志各類書籍，直到目前為止，已經搜羅了十三萬六千餘冊，其中還有不少的珍本書和絕版書，更有一些是價值無比的典籍。在數量上，文史一類的圖書佔了大多數，尤其是詞曲戲劇的資料更加豐碩。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單單綜合性的叢書就有四百多種，辛亥革命以後出版的大學學報和定期刊物也綑羅得相當齊全，共有一百四十多種。這兩年來，又增添了不少新出版的書籍刊物。

中文圖書館藏書的豐富，就目前的情形來說，在東南亞國家中算是首屈一指的。凡是參觀過中文圖書館的各國學者，都有這種評價。圖書館的全部藏書，按照哈佛燕京編目，編成目錄，上中兩冊已經先後出版，下冊相信不久也將問世。

最近，許紹南先生家屬又以許先生生前收藏的全部書刊獻贈給星大中文圖書館。這批藏書，包括新舊書籍五千多種，近七千冊，大部分都是宋元以後的詩詞、戲曲和小說一類的書籍，但更珍貴的是辛亥革命以後所出版的各種學報期刊，在許先生的藏書中幾乎搜得相當的完備。如普通期刊的會友周報、狂飈、晨報、古今、清明月刊、宇宙、六藝、黎明、新青年、活時代、青年界、十日談、現代學生、華年周刊、鞭策週刊、不忍雜誌、貢獻旬刊、羣雅月刊、求是月刊、予曰叢刊、獨立評論、一般雜誌、人民世紀、社會月報、申報月刊、新中華雜誌、北新半月刊、國風半月刊、衆生半月刊、教授與作家、談風半月刊、論語半月刊、新語林半月刊、宇宙風半月刊、上海文化月刊、逸經文史半月刊、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人間世生活思想半月刊；學術期刊的漢學、學原、學林、學術、漢學論叢、學海月刊、學文雜誌、清華學報、清華週刊、國學季刊、國學叢編、國學月報、國學論叢、金陵學報、齊魯學報、暨南學報、歸納雜誌、燕京學報、文哲季刊、輔仁學誌、文藝叢刊、文瀾學報、文史雜誌、文史叢刊、嶺南學報、師大月刊、北京大學月刊、國學月報、師大國學叢刊、女師大學術季刊、中國文化研究彙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北京大學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輯刊、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等等，其中一部分中文圖書館已經擁有，另一部分不但是中文圖書館所無，而且是在任何其他其他地方都難以找到的。

此外，中文圖書館還藏有一批價值難以估計的華文舊報章。這批舊報章，一共有二十七種，包括星馬早期大部分的著名日報，比如總滙新報、星洲晨報、民國日報、檳城新報、南洋時報、和新國民日報等等，出版年代遠自一八八七年起（叻報），直到現在為止（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前後直貫約八十年。這些報章從不同的角度上相當全面地記載了星馬人民，尤其是華族人民在八十年來的歷史活動。有關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風尚、習俗民情各方面的情況，在這批舊報章中，都有廣泛的反映。馬華文學史家方修先生就曾指出：「這批舊報章之所以珍貴，不止在於它本身的資料價值，而且還由於它是目前僅有的一批比較完整的當地文化遺產。如所周知，星馬的文化曾經遭受過一場空前的浩劫，那就是在一九四一年杪日本軍國主義的南侵以及其後對於馬來亞的三年八個月的血腥統治。在這時期，當地的文物典籍，有的毀於兵燹，有的由於物主的出走逃難而散失亡佚，又有的因恐連累人身的安全而被付之一炬或深埋地下。自然，一般人所積存的舊報刊也免不了遇到同樣的命運。因之戰前的出版物十九蕩然無存。那些較早創刊，印數不多，停版已久，的報章雜誌，固然不必說了，就連後期的幾家銷路較廣的大報，如星洲、總滙、南洋等，目前常見的也都以戰後的「復版第一號」為最早。雖然若干文化機關，如星加坡工商學校、檳城光華日報社等，還有少數戰前的舊報紙剩下來，但都是寥寥零星；像現在星大中文圖書館這麼大批的度藏保存，已經是絕無僅有的了。」——對於馬華文學來說

，這批舊報章的史料價值是更加高的。因為它是馬華文學史料的唯一來源，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如果我們是研究馬來亞的教育史，經濟史，社會史，以至美術史，音樂史，沒有這批資料可以援引稽考，還可以從官方文件或其他民族人士的著述中取得部份記錄；唯有整理馬華文學史，除了這批華文舊報章之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了。」（見其未曾發表的「星大所藏舊報章的文學史料價值」一文）

據方修先生的初步估計，星大中文圖書館擁有的這批舊華文報章，保存了七十已仙以上的馬華文學遺產，單從這一點上看，它的珍貴性就能想像得到了。就是根據這些資料，方修先生寫出了「馬華新文學史稿」，并且編纂了「陳鍊青文集」，李廷輝先生寫出了「馬華教育史」，陳雲鶴女士寫出了「馬華報業史」，陳育崧先生寫出了「南洋第一報人（葉季允）」，此外，目前還有許多校內和校外的年青學人根據這些原始資料撰寫「星馬華僑史」，「辛亥革命和馬來亞華僑」，「五四運動對馬來亞文化產生的影響」以及「抗戰期間的馬來亞華僑」等等碩士學位論文。

由于這批報章珍貴無比，尤其是星馬早期刊行的一批，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辦法找到的稀世之寶（保存在倫敦博物院中的也許不像星大所擁有的那麼完整），所以圖書館當局在這幾年來，陸續將它拍成幻燈底片，以便於保存和流傳。在前幾年，星洲日報還曾經向星大購買本身在戰前出版的報紙底片。世界各國研究東南亞問題的專家，有的親身前來翻閱這些報章，有的則向圖書館購買幻燈片。中文圖書館可能將撥出幾年的時間，將所有的這些資料分門別類，編成索引，以利查檢。

中文圖書館的十多萬冊藏書，包括綜合性的叢書四百多種，綜合性的學報期刊兩百多種，和戰前戰後的華文報章將近三十種，已經具備了一般大學中文系應有的圖書數量，尤其是文史方面的資料，基本上可以算是相當齊全了，這對於中文系師生的教學和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觀條件。

學術活動與歷年的出版

學術研究是大學師生最主要的活動之一，在這方面，星大中文系歷年來也有可觀的成果。中文系開辦的最初幾年，賀光中先生主編的東方學報曾出版了兩期，刊載校內外學者的鴻篇巨著。

一九五五——五六年間，中文系教師籌組的中文學會宣告成立，它的宗旨共有三點：（一）促進中華文學與文化的研究；（二）對中西文化作比較研究；（三）出版學報。中文學會的會員除中文系師生外，凡對於中華文學或中華文化有研究興趣的他系師生，也可以加入成為準會員。成立初期，會長一職按照會章規定須由中文系的教師擔任，其餘職員則由系中同學選出。但從一九五九——六〇年起，系中教師建議修訂會章，以中文學會的管理職責，交由系中同學全權擔任，教師僅充會務顧問，屬於諮詢性質，而會長一職則改稱主席。中文學會改組之後，筆者被選為第一屆主席兼首期學報主編。

此後，中文學會便展開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包括邀請校內外和途經當地的各國學者到校發表學術演講，開設中晝班、華文班、和太極拳班，發揚華族文化，組織旅行團，參觀各國的古蹟和教育機構，經常舉辦研討會、辯論會、聚餐會、茶話會、迎新會等等，而更重要的是每年出版學報一期，發表中文系師生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的成果。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中旬，第一期的「中文學會學報」問世。從此以後，學報按年出版，直到去年為止，已經出了七期，每期稿件多的時候，都在二十萬字以上。第八期的籌備工作已經晉入密鑼緊鼓階段，大約在今年年假就可以付印。

這幾年來，中文系教師除個別出版若干專書外，在「中文學會學報」發表的專著，比較重要的有賀光中先生的「詩詞中所表現的中華民族之人格」、「劉鄩甘棠集序」、「讀詞偶識」、「道藏詞目」，錢穆博士的「中國社會的禮俗問題」、「人類文化的展望」、「中國文化與移民」，趙泰先生的「諸子學概論提綱」、「珍重閣集外詩」、「珍重閣唱和集」、「珍重閣集外詞」、「珍重閣集外駢文」、「譯詩」，周辨明

博士的「衝破學說中國話的難關」，王叔岷教授的「文心雕龍駢記」，「慕廬絕句」，林尹教授的「章太炎先生傳」，李廷輝先生的「記事」、「儒學性說批判」、「北歸舟中」（沁園春）、「漢族革命」，稽哲先生的「先秦諸子學的精神」，「名辯與墨辯」，「從莊子內篇觀察莊子思想之體系」。筆者在任教中文系以後，也有兩篇文章在學報上發表：「言志說的檢討」、「廣義的載道觀」。

除教師的專著外，中文系同學歷年來曾在學報上刊載的文章詩詞，共有二百一十五篇，其中有一部分是系中規定的專題作業，另一部分是同學們課餘的精神勞動收穫。

中文學會除出版學術性的學報外，從一九六三年起，還刊行了另一種文藝性刊物——「文藝季風」，發表中文系同學的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的文藝創作，和雜感、隨筆、文學欣賞、作家評介，和翻譯作品一類的文章。第三期文藝季風最近就可以出版，第四期已在積極籌備中。中文系在籍同學必須作專題研究，而攻讀高級學位的同學則必須針對特定的學術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目前在攻讀碩士學位的七位同學，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中國民歌、漢魏樂府、宋元小說、元明散曲、左傳作者的政治與倫理思想、粵劇的起源與發展，和中國科舉制度對中華文學的影響等等。

今後的發展與長遠目標

隨着中小學教育的普遍發展，并為了造就更多的專業人才，以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高等教育務須大力擴展，是在所難免的一種趨勢，而中文系的擴展也是必然的。星大當局曾經一再強調：它對於貫徹政府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和建立多元文化的基本政策，遠自一九五九年起，就已經開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這一點上，由於中文系是星大採用華語為教學媒介的主要學系之一，它對於星大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工作，具有最重大的作用。所以星大中文系今後的發展，將以促進文化交流并達到建立多元文化的最終目標作為基本方針。根據這個方針，中文系將在原有基礎上，一方面大量增收有入學資格的華校學生，一方面則向來自非華文教育源流而又有入學資格的學生開放門戶。前一步步驟是配合華文高等教育的發展，并貫徹星大招收各教育源流學生的既定決策；後一步步驟是為了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并達到建立多元文化的目標。中文系招收非華文源流學生，并不意味着原有水準的降低。因為這類學生，也如華文源流學生要在政府高級中學會考取華文及格一樣，必須具有創橋高級文憑考試的華文及格資格，才能受到考慮，否則將不予以錄取。至于華文源流和非華文源流的兩組學生，除了語文一科（這是畢業考試八種試卷中的一種）將有差別以外，其餘的課程，如中華文學、歷史、哲學、和文化史等，無論教材和水準，都一概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教學媒介而已。假如兩組學生在程度上有着差異，則根據畢業考試的成績，頒以四種不同學位：一等榮譽學位、二等（甲級）榮譽學位、二等（乙級）榮譽學位、普通學位。倘中文基礎太差的學生，不論是來自華文源流或非華文源流，都只能兼修中文，而不能專修中文；也就是說，這類學生只能獲取半個中文學位，另外半個學位須自其他學系獲取。這種辦法，對華文源流或是非華文源流的學生，都是很公允的。

為了實施中文系的擴展計劃，現訂課程將作重大修改。在四年前，星大當局曾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研討設立東南亞研究院的可能性。這個特別委員會曾建議開設馬華新文學、華僑史、語言學、以及中華藝術與考古學等新課程，除了馬華新文學去年已經開設外，其餘的一些需要增開的課程，如國學概論、修辭學、語法學、詩選、文選、小說、戲劇、以及其他重要專書（比如莊子、孟子、史記、漢書）等等，都應該列入應修的課程，并且以師資是否能聘定為據，逐步付諸實施，而現訂課程如第一學年的文學概論、文學原理、新文學、目錄學、和論語等，第二和第三學年的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文學史、文學批評、馬華新文學、通史、哲學史、文化史、專書研究（詩經、楚辭、禮記、左傳）、翻譯和英文等，則將保留。

至于為非華文源流學生所開設的課程，第一年有漢學概論、白話文學、翻譯、以及中華藝術史和考古學等。第二和第三年則有中華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文化史、翻譯、經書選讀和華僑史。

上述新訂課程最近將提出文學院討論，通過後提交評議會批准，由下學年——今年五月開始實施。

中文系今後不但將維持并且還會進一步提高原有的教學水準。這個目的，從逐步實施新課程的過程中必定可以達到。對於攻讀第一級學位（即榮譽學位或普通學位）的學生，中文系將以培養文史哲通才為主要目標，而對於攻讀高級學位的學生，重點則在於培植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或其他各種學科的專才。另一方面，在首三年的初級學位課程中，無論是來自華文源流或其他源流的學生，都將受到多種語文訓練。華文源流的學生，通過其必修的英文和翻譯課程，將可以增強其英文水準；而來自其他源流的學生，則通過三年的語言文學和翻譯課程，將可以達到相當的華文水準。這樣一來，中文系的畢業生都可以兼通華文和英文，這對於他們本身和對於多元民族與多元語言的星馬社會，都有裨益。這是中文系發展的長遠目標。這個目標的完成，有待於教師陣容的加強。所以自筆者去年代理主持系政後，便立即積極和學校當局多方進行物色一名傑出學者，前來擔任已經懸空了十四年的教授職（按英國制大學，每系只有教授一名，教授即系主任，其餘教師均稱講師，與美國制大學每系可有多名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不同）。經過短短的四五個月的努力，已經在國外覓得了一位廣孚眾望的學者，最近即將正式受聘，相信在下學年開學前後，就能前來上任。此外，為配合修訂課程的實施，校方最近已登報聘請中文系講師或助理講師。在今年五月新學年開始之後，中文系將以新姿態出現，以後的飛速發展，是指日可待的了。

（轉載星洲日報一九六七年新年特刊）

星大所藏舊報章的文學史料價值

方修

星加坡大學中文圖書館藏書的豐富是遐邇稱道的，但該館擁有一批價值無可估量的華文舊報章，校外人士却還知者不多。這批舊報章的出版年代，上起一八八七年（叻報），下迄最近數年（星洲，南洋），連貫七十餘載，類別二三十種，包括星馬早期大部份著名的華文日報，如天南新報，總匯新報，星洲晨報，新國民日報，檳城新報，南洋時報，民國日報等等。這二三十種報章，分裝為三幾千冊的合訂本，貯積起來，層層疊疊；卷帙的浩繁，說是汗牛充棟，也不為過。這里面，紀錄着星馬人民，特別是華族人士七十多年來的活動實況，是研究星馬社會經濟，政治，教育，文化，思想各部門歷史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事實上，星大的歷史系同學，近年也已有多人運用這批原始資料，寫成了他們的學位論文，如「六十年來的華文教育」，「馬來亞華文報業史」等等。

這批舊報章之所以顯得珍貴，不止在於它本身的歷史意義，而且還由於它是目前僅有的一批比較完整的當地文化遺產。如所周知，星馬的文化曾經遭受過一場空前的浩劫，那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砂日本軍國主義的南侵以及其後對於馬來亞的三年八個月的血腥統治。在這時期，當地的文物典籍，有的毀於兵燹，有的由於物主的出走逃難而散失亡佚，又有的因恐連累人身的安全而被付之一炬或深埋地下。自然，一般人所積存的舊報刊也免不了淪於同樣的命運。因而戰前的出版物十九蕩然無存。那些創刊較早，印數不多，停版已久的報章雜誌，固然不必說了，就連後期的幾種銷路較廣的大報，如星洲，總匯，南洋等，目前所常見的也都以戰後的「復版第一號」為最早。雖然若干文化機關，如星加坡工商學校，檳城光華日報社等，還有少數戰前的舊報紙剩下來，但都是寥寥星星的多；像現在星大中文圖書館這麼大批的度歲保存，已經是絕無僅有的了。

對於馬華文學來說，這批舊報章的資料價值是更加高的。因為它是早期馬華文學史料的唯一來源，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如果我們是研究馬來亞的教育史，經濟史，社會史，以至美術史音樂史，沒有這批資料可以援引稽考，還可以從官方文件或其他民族人士的著述中取得部份紀錄；唯有整理馬華文學史，除了這批華文舊報章外，就再也沒有辦法可想了。我們知道，其他語言的文籍，是難得有片言隻字談到馬華文學的；而華文報章却一早就建立了它們的優良傳統，它們經常介紹其他語言的文學藝術（如翻譯英文報刊上的作品，翻譯馬來班頓或神話等），經常關注馬華的文藝動態（如新聞版的報導戲劇活動，紀念特刊或新年特刊的發表總結性的文藝論述等等），它們的副刊，更是成了文人學者薈萃，傳播文學藝術的淵藪。因此，離開了目前僅存的這一批比較完整的舊報章，我們就完全談不到整理馬華文學史。

尤其重要的一點是，這批舊報章的文藝副刊，不但沒有其他語言的文籍可以代替，同時也沒有其他華文的出版物，如雜誌專書之類可以取代。早期的馬來亞，由於印刷條件及其他限制，雜誌出版不多，專書更少，差不多九巴仙以上的馬華文學作品都集中在報章副刊上面。我們可以說，截至一九四一年砂太平洋戰事爆發為止，報章副刊始終是馬華文壇的重心，少數的雜誌和專書並不足以為它減輕負擔。這種情況和中國的出版界很有點兩樣。在中國，不但雜誌的出版一路來都很盛行（如辛亥革命前後的「新民叢報」，「江蘇」，「浙江潮」，「中國白話報」；五四運動時期的「新青年」，「少年中國」，「小說月報」，「創造季刊」等等），分別容納了無數舊的或新的文學作品，而且專書的印行也蔚為一種風氣；舊文學作家如章太炎，鄒容，梁啟超，新文學作家如魯迅，郭沫若，葉紹鈞等，大都很早就把他們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作品彙集印佈，使這些作品得到更久和更廣的流傳。在這種情況底下，報章副刊的地位是不太突出的，它的散失亡佚也常常無關宏旨。但星

馬地方却沒有那麼良好的出版條件，沒有那麼繁富多姿的雜誌與專書。所以由援助辛亥革命的時期起，經過一九一九年馬華新文學出現的階段，以迄一九四二年初星馬淪陷為止的三十四年間，售文學方面除了邱叔園一人之外，其他如葉季允，雷鈺崖，區邦侯，林吉雲，楊咽冰，韋意我等，究竟在當地留下了多少作品，一般人多很模糊；新文學方面也只有丘士珍，王奇空，林參天，吳天等寥寥數人出過單行本，餘如譚雲山的許多詩歌，散文，或小說戲劇，就都一直沒有結集印行的機會。所有這些售文學或新文學作品的搜尋輯錄，大部份也只有依賴這批售報章的文藝副刊了。

談到文藝副刊，真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昔時的文藝副刊，值得我們讚賞的地方是太多了。其態度的嚴肅，編排的考究，素質的純淨，內容的結實，這里姑且不論，單就數量方面來看，也就夠使人震驚的。粗略說來，戰前星馬二地，經常有十家華文大報同時存在，如一九三〇年華報，現代日報，新國民日報，檳城新報，光華日報，南洋時報，中南商報，益群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民國日報等；三十年代後半期則有中華報，現代日報，馬華日報，星中日報，星洲日報，總匯報，南洋商報，光華日報，檳城新報，新國民日報等。這些報章，都有其刊期頻密或篇幅開闊的精彩文藝副刊。就較前期的「椰林」，民國日報的「公共園地」，中南商報的「南針」，都是每日出刊的；檳城新報的「椰風」和光華日報的「碧野」，則每週經常有兩大版；南洋時報的「綠洲」，「海絲」，「枕育」，「詩」，「八月」，「玫瑰」，「喇叭」，「怒濤」，「野馬」，「渾沌」，「星火」，「荒原」，「骷髏」等刊物，輪流出版，每日竟有多至三四種的。至於後期的一批，文藝副刊的版位更加固定，從星洲日報的「晨星」，南洋商報的「獅聲」，星中日報的「星火」，新國民日報的「新路」——「新光」，總匯報的「世紀風」——「文會」，以至光華日報的「檳風」，檳城新報的「野風」，現代日報的「前驅」，吡叻中華報的「大眾副刊」，吉隆坡馬華日報的「前哨」等等，全部都是日刊，每天半版或全版，絕少間斷。現在，姑以每家報章的副刊平均每天推出五千字作品計算，則十家報章就是五萬字，一年就是二十萬字；也就是說，戰前二十年間的馬華文壇，每年平均都有二十萬字的文學產品，其份量約等於三四百冊星馬近年出版的「半山月刊」，「現代文藝」，「南風」，「浪花」那樣的雜誌。想這這類雜誌目前每年間祇能產生十冊八冊，我們就會驚異於過去的文藝界的精神勞動的收穫是多麼的巨大，驚異於等待我們去發掘繼承的馬華文學遺產是多麼的豐碩繁富了。

當然，要求這一筆豐碩繁富的當地文學遺產，能夠幸運地為星大中文圖書館完整無缺的保留下來，那是太過奢望的。星大中文圖書館所度藏的二十種售報章，正如前文說過的，是現存的比較完整的一批而已，並非應有盡有，搜羅無遺。它的主要的闕漏，就原來的情况（一九六二年初以前）來說，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類別上的不夠完備，若干種重要的報章始終未曾收藏；包括吉隆坡的益群報，馬華日報，怡保的中華報，檳城的現代日報……等等。一是某一段時期的欠缺；例如星加坡的叻報，原發刊於一八八〇年，這里保存的却是由一八八七年開始，其後的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一九二三數年，都有若干月份遺漏；檳城的光華日報，創刊於一九一〇年，這里所有的却是始於一九二七年中，而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一年間，也有某些月份份之缺如。此外如一九二八年以前的南洋時報和檳城新報，都同樣有這種整年或整月全部闕漏的現象。

這是一九六二年初以前所見的情况，也是這一批售報章原來的闕漏情况（參閱星大中文圖書館編製目錄）。這里所闕漏的資料，就發掘馬華文學遺產而言，有些確是相當重要的，諸如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光華日報，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南洋時報，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的檳城新報，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的益群報，一九三六至三七年中華報，一九三七至四一年的現代日報，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馬華日報，一九四一年的吉隆坡新國民日報等等。這些報章當時都擁有很堅實的副刊，發表了大批極優秀的馬華新文學作品，它們的湮沒散佚，便成了一种無可彌補的缺陷。不過，總的說來，問題並不見得怎樣嚴重，現有的這二十種售報章所保存的馬華文學史料，最低限度是在七十巴仙以上。而且遺漏

的部份大致集中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以前，其後的很多重要的作品，絕大部份都還安然無恙，特別是後來星加坡各大報的紀念特刊或新年特刊中一些帶有總結性的文藝論述，更是一篇也不曾缺少，給予整理馬華文學史的人以非常的方便。至於研究其他部門的歷史活動，如政治，經濟，教育等，則更少受到影響。因為除了最早數年的叻報之外，很多有關的新聞材料，各報都大同小異；此有彼無，盡可相互為用，參合彌縫。不像副刊上的詩文創作，各有不同內容，缺了一篇就少一篇，無從取得補償代替。所以，對於其他部門的歷史工作者來說，這二三十種出報物，更是一片蘊含無盡的礦藏，儘夠他們去採求發掘。

然而，一九六二年初以後，這批舊報章慘遭不肖之徒的一番撕割盜竊，闕漏的情況，就大大的嚴重起來了。竊賊此來，計劃週詳，目標明確，專揀一些最重要的資料下手，因而所造成的損失，與這批報章原先由於搜羅不週而產生的某些闕漏就完全不同。如果說，原來的闕漏是局部的，不大嚴重的，主要只影響到較早期的一段文學歷史活動，而且大致局限於中北馬地區，那麼，這一次失竊所造成的損失，却是全面的，致命的，不論近期早期，不分南馬北馬，凡是整理馬華文學史所需要參考的重要資料，都被洗劫一空，祇留下一批刺漣殘滓。根據初步調查的結果，竊賊的傑作，同時表現在下列三方面：

一，各報的紀念特刊或新年特刊中的一些帶有總結性的文藝論著，舉凡賊手所及，全部被撕割了去。單舉南洋商報為例，該報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十二週年紀念特刊中的「十二年來的馬來亞文壇」（鄭文通），一九三八年新年特刊中的「一九三七年馬華文壇概況」（蔡貞堅），一九三九年新年特刊中的「一九三八年馬華文藝界的一角」（陳如舊），一九四〇年新年特刊中的「一年來（一九三九）的馬華戲劇運動」（歐陽正名），「一年來的馬華文藝界」（如舊）……等長篇論著，每一篇都沒有例外地遭了毒手。

二，各報文藝副刊，如南洋時報的「荔」，「星火」，中南晨報的「南針」，民國日報的「公共園地」，「新航路」，「流露」，「文藝」，南洋商報的「曼陀羅」，「獅聲」，「今日文學」，星中日報的「星火」，星洲日報的「晨星」……等，祇要是多登小說，理論或雜文的，盡被擇要而噬，弄得支離破碎。許多連載的短篇或中篇創作，更變成了有尾無頭，不知所云。例如丘士珍的「峇峇與娘惹」，由一九三二年六月廿日起，分為十七節在民國日報「公共園地」發表，竊賊就把它拿來砍頭挖心，截取其第一（六月廿日），第二（六月廿一日），第八（六月廿日）數節，好好的「一篇馬華文學史上的名著，就這樣成為斷簡殘篇了。諸如此類的情況，比比皆是。

三，各副刊或特刊中，凡有任何文獻，對於某些人的陰謀顛倒是非，歪曲歷史有所不利者，一概被斬草除根，企圖毀屍滅跡。如一九三三年初民國日報的副刊上很多駁斥鄭文通對於青年勵志社公演的「芳娘」，「綠林中」，「一侍女」等劇的批評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初星中日報的「星火」上很多批判李紫鳳所主編的「獅聲」副刊的文章，就都被撕得乾乾淨淨，隻字不留。一九三七年新國民日報新年特刊上李潤湖那篇三萬字的長文——「一年來（一九三六）的馬來亞文壇」，因為對於「星火」與「獅聲」的論爭的經過，有着詳細與正確的報導，暴露了太多的東西，大大的觸犯了竊賊的忌諱，不消說，更是在掃蕩剷除之列了。

總之，竊賊所採取的就是這樣的一種「三光政策」——偷光歷年來所有的總結性的文藝論著，偷光每一頁登有重要的文學作品的文藝副刊，偷光一切對於某些人企圖歪曲歷史的陰謀有所不利的重要文獻。在這種「三光政策」的殘酷的蹂躪下，這二三十種舊報章，幾乎體無完膚。總的損失，估計不下三五百頁，都是文學藝術史料精華所在。其中的一小部份，早經星大圖書館攝影存底，有了幻燈菲林可看，不至於被竊賊趕盡殺絕，的確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大部份却還來不及拍攝，便就此落入賊手，永世不能再見天日。這真是馬華文藝史料數十年來所遭受的一場最大的災害，較之日本帝國主義者三年八個月的摧殘破壞尤為慘烈嚴重。今後從事整理馬華文學史的人，縱使不致因此被蒙蔽，被誤導，也有很多重要環節，重要作品，要永遠留下空白，無法填補了。如果說，一九六二年前，星大中文圖書館度藏的這批出版物所保留的馬華文學史料，還有七八十巴仙之多，那麼，經過這一場大災害，大劫難之後，大概就只剩下五十巴仙而已。

隨着大批馬華文藝史料的歷劫，其他部門的歷史資料，也意外地遭受到空前慘重的犧牲。其中一小部份是被竊賊順手牽羊攫取去的，大部份却是由於與文藝副刊，或特刊的文藝版合印為一張報紙而受到株連。因為報紙是兩面印刷的，缺了一面（一頁），就等於喪失了另外一面，即整張報紙。而特別重要的還是那些紀念特刊和新年特刊，它們的文藝版的另外一面，經常是其他部門的活動的總結性論文，如一年間星馬政治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經濟情況，教育情況的檢討之類。這些文章都是各報的特稿，各有各的觀點，各有各的取材，是研究星馬各部門歷史活動的珍貴的參考資料，任何一篇的失去，都和文藝稿件一樣，無從取得補償代替，不像新聞版的一般性報導，可以互相彌縫湊合。現在，這些珍貴的資料，也因大批紀念特刊，新年特刊的文藝論著的被盜竊而遭了池魚之殃，無由重睹了。一九六二年初以前，圖書館所存的舊報章的某些月份的闕漏，都是屬於新聞版的；這些特稿却還完好無缺，一篇篇保留在各報的紀念特刊和新年刊特上面，不料一九六二年初以後，竟遭此無妄之災，變得面目全非。我不知道今後的歷史工作者，他們的研究工作要因此增加了多少百倍的困難。

這樣的一場文獻史上的大災害，大劫難，不發生於多次兵燹戰亂之中，不發生於蛀虫蠹魚的長年累月的蠶食侵蝕，乃發生於自私自劣，喪盡天良的不肖之徒的毒手與刀片之下，說來好不令人痛心。

自從這批出版物遭此巨禍之後，星大中文圖書館便強化保護措施，除了幻燈底片之外，原報刊不再輕易取出借閱。甚至圖書館內部也已大事改建，加嚴管理，以防不肖之徒再度潛入行竊。雖然竊賊鬼計多端，此路不通，又另闢蹊徑，到工商學校去上下其手；或者乘著星大圖書館因儲藏室地方太擠，把部份舊報章移到其他圖書館寄存的機會，出其不意地來一個突擊，駕輕就熟，滿囊而歸，但就度藏於星大圖書館的一部份來說，倒是防範得十分嚴密，未再發生任何意外。

然而，這麼一來，都苦了校內校外的一般學術工作者。因為他們借閱舊報章，從此增加了一番麻煩的手續，不若以前那麼簡便了。於是很多人都不勝憤慨，異口同聲，痛斥害群之馬，一人做賊，衆人受累，學術界混入這麼一個敗類，真是無上的恥辱。

不過，如果單就借閱舊報章的問題而論，則比較麻煩的祇是其中未曾攝成幻燈底片的一部份；至於那些已經拍攝過的，倒是可以利用幻燈底片，除非有興趣欣賞或研究竊賊的撕割藝術，否則是不必翻閱原報刊的。因而，筆者以為星大圖書館目前必須儘量設法，把若干種尚未有幻燈底片的重要報章，趕工攝製，以應付校內校外的一般需求。一方面也可使到這批殘存的文獻，有了安全保障，免得再遭一次噩運，連身屍都被吞去了。

茲將星大中文圖書館原先度藏的各種報章的名稱，年份，以及目前分開存放地點，拍攝幻燈底片情況，列表於下，以便一般學術工作者查覽：

叻報	一八八七——一九三二（已攝影）	星洲日報	一九二九——一九五三（攝）
國民日報	一九一四——一九一九（未攝影）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未）
振南報	一九一三——一九二〇（未）	南方晚報	一九五〇——一九五一（攝）
光華日報	一九二七——一九四一（未）		一九五五——一九六三（未）
	一九五一——一九六二（攝）	昭南日報	一九四二
檳城新報	一八九五——一九四一（未）		（未）

（以上各報現存星大中文圖書館）

總滙(新)報 一九〇八——一九三一(攝)
 一九三二——一九四六(未)
 天南日報 一八九八——一九〇五(未)
 星洲晨報 一九〇九——一九一〇(攝)

星報 一八九〇——一八九八(未)
 新國民日報 一九一九——一九四〇(拍攝中)
 日新報 一八九九——一九〇一(攝)

(以上各報現存星大圖書館儲藏室)

南僑日報 一九一一——一九一四(未)
 中南農報 一九三〇 (未)
 民國日報 一九三〇——一九三四(未)
 南洋時報 一九二七——一九三〇(未)
 南洋商報 一九二三——一九五二(攝)
 一九五五—— (未)

南鐸日報 一九二三——一九二五(未)
 華僑日報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未)
 星中日報 一九三五——一九四〇(未)
 星振日報 一九五一——一九五七(攝)
 一九六〇 (未)

(以上各報現存星加坡國家圖書館)

右列祇是一個簡表；較詳細的情況，星大中文圖書館另有編目。各種報章凡已拍攝過的，其幻燈底片，也均存於中文圖書館，可供各界借閱，至於最近數年較為銷行的報章，如星洲，南洋等，因為國家圖書館已有幻燈底片的攝製，星大圖書館大概不會再重複拍攝了。

(附記)

本文初稿於一九六三年抄應星大中文圖書館主管人之約寫成，準備編入該館的十週年紀念特刊。後因館務繁忙，刊物沒有出版，稿件也就擱置了起來。最近承將原文檢出退還，適逢中文學會報主編先生頻頻催稿，乃略為增刪改抄，匆匆繳卷。祇恐此類介紹圖籍報刊之粗淺文字，不合中文學報深刻討論學術問題之傳統內容，有負主編先生雅意耳。(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

從論語中看孔門的文學思想

林徐典

中國文學思想研究之三

引言

論語是記載孔子言行的一部哲理散文。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時代魯國陬邑人。他的先代孔父嘉，是宋國的大貴族，後來由于在政治上失敗，便逃亡到魯國。他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陬邑宰，但在他出世不久便已去世了。由于「少貧賤」的關係，孔子「多能鄙事」，早年還做過委吏和乘田。他又曾一度出任魯國的司寇，但是時間很短。從十五歲開始，他便有「志于學」，而且「發憤忘食」、「好學不倦」，到了三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成為當時著名的學者。

在政治上，孔子的思想真是比較保守的。他主張通過教化的途徑，挽救「世道人心」，維持封建社會的舊有制度和秩序。為了宣揚他的政治學說，他曾經週遊列國，游說各國的國君，希望能夠施展他的政治抱負。但由于當時各國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已經十分深刻化了，他的守成思想不足以解決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所以到了晚年，他又回到魯國，從事整理文獻和教育門徒的工作。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是打破官學制度，以學者資格設教授徒的第一人。他「有教無類」，普及了教育，相傳一生教育過三千名弟子，其中有成就的共七十人。

孔子活了七十三歲（前五五一——前四七九）。（註一）在他死後，他的弟子們把他們直接或間接所聽到的他的言行記錄下來，作為講學資料。這些資料後來被人編纂成書，這就是流傳下來的論語。

我們雖然可以確定，論語是孔門弟子編纂的，但是這些弟子是誰，歷來却有着三種不同的說法。班固以為「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劉向別錄和趙岐孟子題辭也有相同的說法。他們都泛指論語是孔門弟子所記的。但鄭玄却說它是仲弓、子游、和子夏等所撰（見釋文叙錄與論語音義引文，論語古訓、論語注逸文、傳子與象山語錄也有類似的記載）。而程頤又有另一種說法，以為論語是有子和曾子的門人編的（見論語集注序說）。

其實，論語並不是一人一時的著作，關於這一點，近人楊伯峻曾作過一番考証。他說：論語一書，篇幅不多，但却出現了不少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還有的是同樣一個意思，却有各種不同的記載的，我們對於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就是：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到後來才彙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他又根據子罕、憲問、泰伯和先進篇的記載，証明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這從詩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出來。因而論語的著筆是有先後，其間的距離可能有三五十年。他的結論是：論語的編定者也許是曾參的學生，著筆當開始于春秋末年，而編輯成書則當在戰國初期。孟子書中經常引用論語的話，可以推想論語成書必在孟子之前（見論語譯注導言，第二一五頁）。

這一部書取名論語，始於西漢中叶。王充論衡正說篇便指出：「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論語傳到漢代，有三種不同的本子：一是魯論，共二十篇；二是齊論，共廿二篇；三是古論，共廿一篇。古論在篇章上和層次上，都和魯論二論不同，文字不同的有四百多字。魯論和齊論最初都有師傳。到了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又以魯論的篇目為根據，把這兩個本子合而為一，定名為張侯論。古論是在景帝時代由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的牆壁中發現的，因為當時今文盛行，古論并沒有人傳授。一直到東漢末年，鄭玄才以張侯論為依據，并且參照魯論二論，為論語作注解，這就是一直流傳到今天的論語本子。

雖然，某些學者如崔述等，曾經懷疑論語中可能有後人杜撰的材料，但是無論如何，這部書無疑的是研究孔子和孔門弟子思想的第一手資料；它不但記述了孔子和他的門徒的哲學思想和政治理想，而且還間接地透露了他們對於文學問題的看法。雖然孔子是哲學家而不是文學家，更不是文學批評家，他的學說主要是針對哲學問題而發的，對於文學創作上的問題，他從來沒有直接發表過意見，但我們從他對哲學問題所發表的言論中，却能推斷出他對於文學創作的見解。本文便是企圖通過孔子和孔門弟子的倫理、教育、政治和哲學觀點，對他們的文學思想進行初步窺探。

「文」與「文章」及「文學」的含義

先秦子書都是「以立意為宗」的哲理論著，不是「以能文為本」（俱蕭統語，見文選序）的文學作品，加上當時的學術和文學又是渾然不分，所以先秦哲學家所說的「文」、「文章」或「文學」，和現在一般概念中的「文」、「文章」或「文學」是有所不同的。

在論語中，「文」字凡廿四見，兩處是指文王，如：「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子張）三處是指謚號，如：「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一處是指塗飾：「子夏曰：『小人之道也必文。』」（子張）一處是指文飾：「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一處是指文辭：「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衛靈公）一處是指文采：「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兩處是指文化，如：「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兩處是指學問，如：「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但是所有這些都和文學沒有直接關係，和文學有關係的是指文獻的這幾個例子：

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孔子所說的「文」，是泛指古代的一切文獻。馬融指出：文是「古之遺文」（論語馬氏訓說）。鄭玄也說：文是「道藝」（論語鄭氏注）。朱熹又說：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論語集注）。黃震史說：文是「禮樂射御書數」（黃氏日抄）。這樣的「文」，不但是泛指古代的一切文獻，甚至於還包括了所有的技術工藝，它不是專指文學，是很明顯的。

侯外廬也指出：論語中所說的「文」，有兩種含義：其一指禮樂制度的道理，其二指道德的規範，後一種含義又是從西周文明的「文」字繼承下來的，指的是西周先王的德，猶如「思文后稷」、「允文文王」的「文」。換句話說，孔子（包括他的弟子）所說的「文」，其實是一般的文教，而這種文教，又是從西周文明的觀念為範疇的，它是孔子知識論的對象（見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六二—六三頁）。

孔門弟子所說的「文」，也和孔子所說的「文」，有同樣的含義。顏淵稱讚孔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子貢糾正棘子成的錯誤：「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顏淵）他們所說的「文」，也是廣義的「文」，具有教化和文采的意義。

在論語中，「文章」一詞凡二見，一處指文獻方面的學問：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另一處則指禮儀制度的美好：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

前例涉及文獻，還和文學有間接的關係，但後例却和文學完全無關了。

至于「文學」一詞，在先秦古籍中，要算論語用得最早。而這個詞彙，在論語中只一見：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這裡所說的「文學」，和「文」的含義一樣，所指的也是古代的文獻。在孔門弟子中，學習古代文獻有心得的，是子游和子夏二人。關於「文學」的含義，楊雄和邢昺都作過一些說明。楊雄法言吾子篇說：「子游子夏得其書矣。」邢昺論語疏說：「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

「書」是古籍，文章博學則是一般學術，這和現在一般人所說的文學是截然不同的。郭紹虞說：先秦時期「文學」一詞所以具有「文章」與「博學」兩種含義的原因，在于「周秦是文學與學術文混合的時期。……（當時）文學之用不廣，以口耳治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所以詩歌圖屬韻文，而學術文字也往往協比其音，錯綜其言，其修辭工夫亦無異于詩歌。學術之文與文學之文猶不顯著絕大的分別，所以所謂『文學』，便兼有『文章』與『博學』二義。」又說：「孔門雖不曾分文章博學為二科，而在『文學』總名之中，實亦分括文章博學二義。大抵時人稱名：就典籍之性質言，則分為『詩』『書』二類；就文辭之體裁言，則別為『詩』『文』二類。孔門所謂『詩』，即邢昺所謂『文章』一義；其所謂『文』或『書』，則邢昺所謂『博學』一義；而『文學』一名，又所以統攝此二者者。」（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第六及第十二頁）因而，孔子論詩是合乎文學定義的，而他論文或文學範圍却非常廣闊，具有文獻和文藝兩種不同的含義。對於這一點，我們是必須辨別清楚的。

「興」「觀」「羣」「怨」——文學的政治作用與教育效能

由于孔子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同時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他設教授徒，目的便在于培養從政和傳播文化的儒者，所以他也特別強調文學的政治性和教育性。他認為文學有兩種重要作用，一種是政治作用，一種是教育作用。他說：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迺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朱熹以為興是「感發意志」，觀是「考見得失」（論語集注），孔安國說羣是「群居切磋」，怨是「怨刺上政」（論語孔氏訓解）。把這幾種作用連繫起來，用一句話來概括它，便是：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觀），它不但具有感染性和啟發性（興），能夠使讀者受到群體的教養（羣），而且還是指導政治和改革社會的有效工具（怨）；此外，文學又是齊家（事父）、治國（事君）和探求科學知識的鎖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觀怨和事君是政治作用，興羣事父和多識于鳥獸及草木之名則是教育作用。

孔子強調文學的政治性，是不無理由的，因為作為儒者的「士」，根本就是「一些候補官吏」（註二），而從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詩歌除了作為娛樂祭祀的用途外，最重要的就是用于政治或是外交酬酢，後者又分為獻詩和賦詩兩種不同的方法，獻詩的目的在於頌美或諷諫，賦詩的目的在於表示自己的政治或外交立場。孔子對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又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陽貨）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指的也就是獻詩和賦詩這兩件事。因為詩歌在當時具有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重要用途，所以「誦詩三百」最主要的目的，便在於準備他日被「授之以政」或者是奉命「使於四方」的時候，能「達」能「對」。文學作品必須能和政治生活結合才有用途，否則「雖多」也是「奚以為」的。

除了政治上的作用以外，文學還有教育上的作用。對於後者，孔子也是很重視的。在他看來，文學所能夠產生的教育效能，並不遜于禮樂